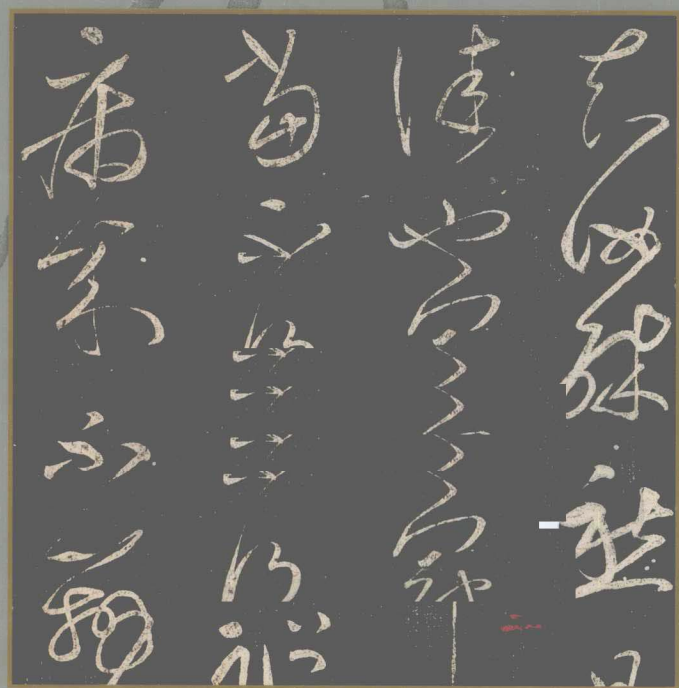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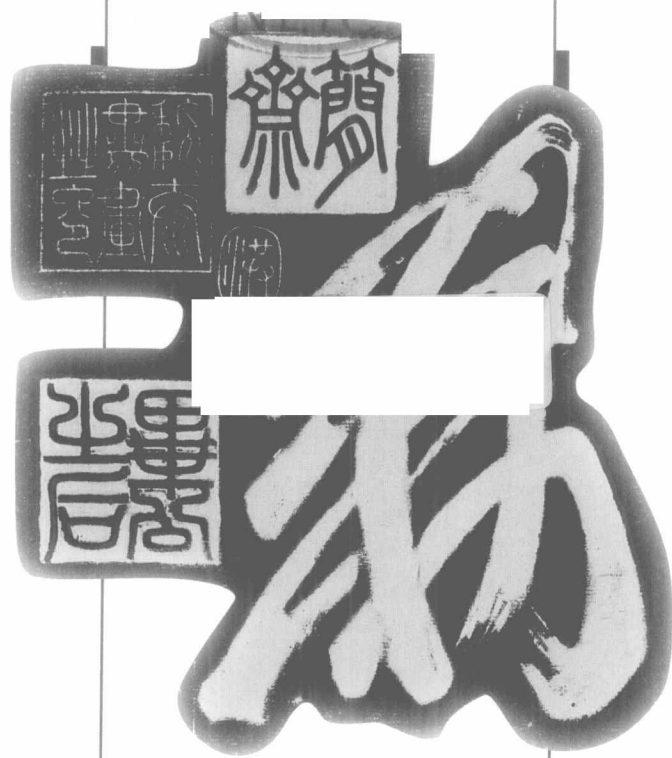


# 名帖善本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名帖善本



主編：施安昌  
商務印書館

# 名帖善本

Rare Book of Famous Calligraphic Specimens

##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編：施安昌

副主編：尹一梅

編委：王禕

攝影：劉明傑 馬曉旋 孫志遠

出版人：陳萬雄

編輯顧問：吳空

責任編輯：徐昕宇 黃東

設計：張婉儀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羅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版：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刷：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 2008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340 4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 2008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特邀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世襄 王 堯 李學勤 金維諾  
宿 白 張政烺

總編委主任委員：鄭欣淼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杜迺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輝柄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耿寶昌 晉宏達 徐邦達 徐啟憲  
陳麗華 張忠培 單國強 楊 新  
楊伯達 鄭珉中 鄭欣淼 蕭燕翼  
聶崇正

主 編：李文儒 楊 新

編委辦公室：

主 任：徐啟憲  
成 員：李輝柄 杜迺松 余 輝 邵長波  
胡 錘 施安昌 秦鳳京 郭福祥  
陳麗華 單國強 鄭珉中 聶崇正

總攝影：胡 錘

# 總序

楊新

故宮博物院是在明、清兩代皇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博物館，位於北京市中心，佔地七十二萬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萬件。



城內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陳列所。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內廷，紫禁城後半部分於一九二五年建成故宮博物院。

歷代以來，皇帝們都自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他們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視作自己的財產。因此在宮廷內，不但匯集了從全國各地進貢來的各種歷史文化藝術精品和奇珍異寶，而且也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師，創造新的文化藝術品。中間雖屢經改朝換代，宮廷中的收藏損失無法估計，但是，由於中國的國土遼闊，歷史悠久，人民富於創造，文物散而復聚。清代繼承明代宮廷遺產，到乾隆時期，宮廷中收藏之富，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度侵入北京，橫燒劫掠，文物損失散佚殆不少。溥儀居內廷時，以賞賜、送禮等名義將文物盜出宮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一九二三年中正殿大火，清宮文物再次遭到嚴重損失。儘管如此，清宮的收藏仍然可觀。在故宮博物院籌備建立時，由「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其所藏進行了清點，事竣後整理刊印出《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共六編二十八冊，

計有文物一百一十七萬餘件（套）。一九四七年底，古物陳列所併入故宮博物院，其文物同時亦歸故宮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戰期間，為了保護故宮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和戰火的毀滅，故宮博物院從大量的藏品中檢選出器物、書畫、圖書、檔案共計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分五批運至上海和南京，後又輾轉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文物復又運回南京。隨着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於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被運往台灣，五〇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運返北京，尚有二千二百一十一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宮博物院於南京建造的庫房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故宮博物院的體制有所變化，根據當時上級的有關指令，原宮廷中收藏圖書中的一部分，被調撥到北京圖書館，而檔案文獻，則另成立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負責收藏保管。

五〇至六〇年代，故宮博物院對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進行了清理核對，按新的觀念，把過去劃分「器物」和書畫類的才被編入文物的範疇，凡屬於清宮舊藏的，均給予「故」字編號，計有七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件，其中從過去未被登記的「物品」堆中發現一千二百餘件。作為國家最大博物館，故宮博物院肩負有蒐藏保護流散在社會上珍貴文物的責任。一九四九年以後，通過收購、調撥、交換和接受捐贈等渠道以豐富館藏。凡屬新入藏的，均給予「新」字編號，截至一九九四年底，計有二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件。

這近百萬件文物，蘊藏着中華民族文化藝術極其豐富的史料。其遠自原始社會、商、周、秦、漢，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歷五代兩宋、元、明，而至於清代和近世。歷朝歷代，均有佳品，從未有間斷。其文物品類，一應俱有，有青銅、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書名畫、印璽、漆器、琺瑯、絲織刺繡、竹木牙骨雕刻、金銀器皿、文房珍玩、鐘錶、珠翠首飾、家具以及其他歷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種，又自成歷史系列。可以說這是一座巨大的東方文化藝術寶庫，不但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化藝術的歷史發展，凝聚着中國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時它也是人類文明進步不可缺少的組成元素。

開發這座寶庫，弘揚民族文化傳統，為社會提供了解和研究這一傳統的可信史料，是故宮博物院的重要任務之一。過去我院曾經通過編輯出版各種圖書、畫冊、刊物，為提供這方面資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對於推動各科學術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種全面而系統地介紹故宮文物以一窺全豹的出版物，由於種種原因，尚未來得及進行。今天，隨着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頻繁往來，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故宮。學者專家們，無論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歷史，還是從事於東、西方文化的對比研究，也都希望從故宮的藏品中發掘資料，以探索人類文明發展的奧秘。因此，我們決定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統地反映故宮文物收藏的大型圖冊。

要想無一遺漏將近百萬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數十年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在考慮到社會需要的同時，不能不採取精選的辦法，百裏挑一，將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來，約有一萬二千餘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這需要八至十年時間才能完成，可以說是一項跨世紀的工程。六十卷的體例，我們採取按文物分類的方法進行編排，但是不囿於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與宮廷歷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文物，則採用特定主題的編輯方法。這部分是最具有宮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們所忽視，而在學術研究深入發展的今天，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歷史價值。另外，對某一類數量較多的文物，例如繪畫和陶瓷，則採用每一卷或幾卷具有相對獨立和完整的編排方法，以便於讀者的需要和選購。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務是艱巨的。為此我們動員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內老一輩專家和聘請院外若干著名學者為顧問作指導，使這套大型圖冊的科學性、資料性和觀賞性相結合得盡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於我們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務由中、青年人承擔，其中的錯誤和不足在所難免，因此當我們剛剛開始進行這一工作時，誠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評指正和建設性意見，使以後的各卷，能達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謝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忠誠合作！感謝所有支持和鼓勵我們進行這一事業的人們！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於燈下

## 導言

施安昌



延禧宮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位於東二長街東側，初名長壽宮，本是內廷所謂「東六宮」之一，明清兩朝均為妃嬪之居所。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改稱延祺宮，清初，乃改名為延禧宮。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延禧宮遭遇大火，焚毀殆盡，僅餘宮門，由此荒廢。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清廷決議在其原址興建一座三層西洋式建築——水殿。據《清宮詞》記載，水殿有着拜占廷式穹頂，以銅作棟，玻璃為牆，牆之夾層中置水蓄魚，底層地板亦為玻璃製成，池中游魚一一可數。人在屋內透過玻璃壁窗可以仰望碧天遊雲，俯察魚翔淺底。隆裕太后題匾額曰「靈沼軒」，俗稱「水晶宮」。此工程耗資頗多，其時國庫空虛，此項修建直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冬尚未完工，隨着清帝遜位，遂被迫停建。

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一九三一年，利用延禧宮舊址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的文物庫房，北樓三層，東西兩樓二層。仍然是紅牆黃瓦，與周圍一切都很和諧。一九五四年故宮建立文物專庫，延禧宮西側是繪畫庫，東側樓上法書庫，樓下是碑帖（銘拓）庫，北樓則三家共有。自此以後，全部碑帖在此安家達半個世紀，並逐漸擴充到兩萬五千餘件。

二〇〇〇年起，延禧宮的全部文物開始遷出，轉入到新建的地下庫房，恰逢近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之《名帖善本》卷，選介故宮名帖之餘，予所作序言，遂以「延禧宮帖話」名之，以為紀念。

### 一、刻帖釋義

所謂帖，《說文解字》釋為「帛書也」。原是指名家寫的詩文、信札、帛書等墨跡手書。後來乃有將帖刻於石上或木上，便於學習者傳拓，以廣流傳。這種供習字者作為範本的拓本或拓本之影印本，便統稱為帖或字帖。未有刻帖之前，複製流傳名家手跡，大致不外臨摹、雙鉤廓填、硬黃紙鈎摹、響拓四類。

與碑相比，帖有着很多不同。從外觀講，碑是豎石，帖是橫石。帖石一般高尺許，寬二尺五、六寸，也有木版刻帖的。碑建於墓前、路旁或宮廟院內，帖則置於室內廊下或直接鑲在壁上，供人觀瞻、傳拓。從內容講，碑一般是記述當代人物與事件，以誌紀念。帖則是將古代和前代的名人墨跡（如書札、詩文、文書等等）摹刻上石，拓下來後供臨摹書法之用。

帖從編、集體例來看，通常有兩類，一是叢帖，即多人書作的彙編或某個人書作的編集。二是單帖，即某人所書一件作品，單獨摹刻而流行。

今天已知的叢帖有三百五十餘種。較為著名者有宋《淳化閣帖》、《大觀帖》、《絳帖》、《汝帖》、《羣玉堂帖》、《寶晉齋帖》、《鳳墅帖》，明《東書堂帖》、《戲鴻堂帖》、《停雲館帖》、《真賞齋帖》、《快雪堂法書》，清《三希堂法帖》、《懋勤殿法帖》。集個人書的叢帖有王羲之《十七帖》，顏真卿《忠義堂帖》，蘇東坡《西樓帖》，黃庭堅《黃文節公法書》，米芾《紹興米帖》、《英光堂帖》，蔡襄《蔡忠襄公法書》，趙孟頫《松雪齋帖》等等。通常講到的單帖則有魏鍾繇《宣示表》、《薦季直表》，王羲之《蘭亭序》、《東方朔畫贊》、《曹娥碑》、《樂毅論》、《黃庭經》，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孫過庭《書譜》，懷素《聖母帖》、《千字文》，鍾紹京《靈飛經》、顏真卿《爭座位帖》、《祭姪文稿》，元趙孟頫《道德經》等等。

## 二、刻帖源流

勒石為帖，自唐弘文館《十七帖》始。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十七帖》後：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或有以為叢帖（套帖）則始於南唐，如所謂《昇元帖》，元陶宗儀《輟耕錄》說：「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但原石原拓早已無存。宋人文獻中便已無《昇元帖》的具體記載。

今天能見到的最早刻帖，是後世稱為法帖之祖的《淳化閣帖》。

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命王著甄選秘閣所藏歷代名人法書，摹刻成一部十卷叢帖，刻於河南開封宋內府，以李廷珪墨拓出，此即著名的《淳化閣帖》。該帖卷一為歷代帝王書，卷二、三、四為歷代名臣法帖，卷五為諸家古法帖，卷

六、七、八為王羲之書，卷九、十為王獻之書。總計書法作者一百零二人，計四百餘帖。每卷卷末刻篆書款「淳化三年壬辰十一月六日奉旨模勒上石」。此帖因原拓不多，又因歷代名家書跡薈萃一帖之中而深得士子青睞，歲久版毀，公家私家轉相傳摹，翻刻不絕。如哲宗元祐年間（一一〇八—一一一〇）的「二王府帖」，高宗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的「紹興國子監刻本」，孝宗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的「淳熙修內司帖」，還有版本甚多的「泉州本」等等。故宮收藏多種不同版本的閣帖，本書均有著錄。其中懋勤殿舊藏之宋拓本，殊為珍貴，《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已有上下兩冊單獨出版，此處不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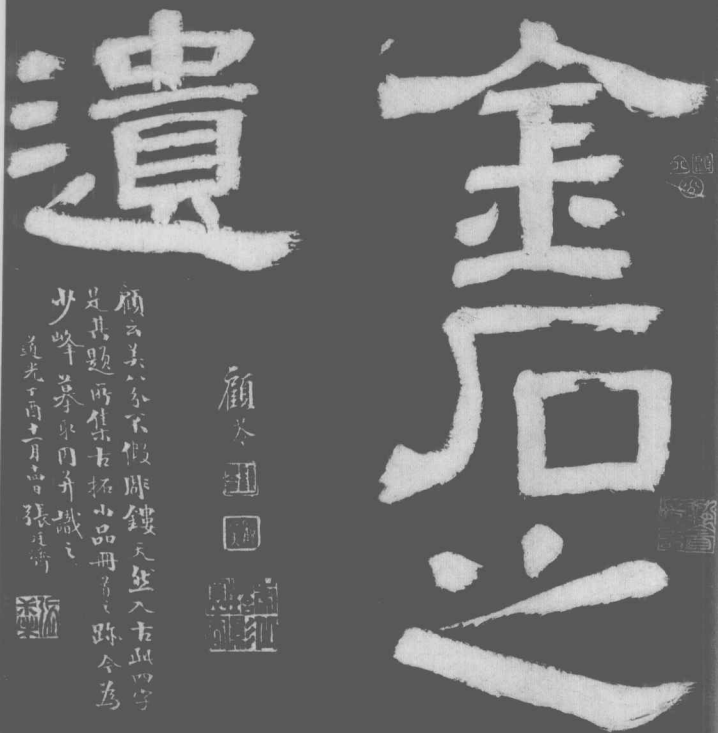
宋代刻帖從初起到興盛，三百年不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宋代國策崇尚文治，嗜好書畫為士林風氣，而太宗、徽宗、高宗等本身便是書家，上下相尚，遂習字刻帖蔚為潮流。另一方面，也離不開雕版印刷在宋代的發展。有宋一代，刻版印刷技術高度發達。北宋時，中國南北各地均擁有一批雕版高手，較好的雕版材料多用梨木、棗木。因此，對刻印無價值的書，有以「災及梨棗」的成語來諷刺，意思是白白糟蹋了梨、棗樹木，可見當時刻書風行一時。對文化的重視，加之高超的雕版印刷技術，使宋代的書籍刻印質量之高空前絕後。近代藏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曾說：「藏書以宋刻為善，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涇跡。」「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盡矣。」刻書與刻帖於技術上差異並不很大。既有文化氛圍、上下的推賞，則在雕版印書的同時，從京城到地方的刻帖之風也日益盛行。

宋代叢帖數量龐大，從內容上分有歷代綜合帖、宋代綜合帖和個人專帖之不同。可惜其中多數今已不存，現存可見的叢帖分列如下：

歷代綜合帖：《淳化閣帖》、《絳帖》、《星鳳樓帖》、《大觀帖》、《汝帖》、《鼎帖》、《甲秀堂帖》、《羣玉堂帖》、《鬱孤臺法帖》、《寶晉齋法帖》、《澄清堂帖》、《蘭亭續帖》。

宋代綜合帖：《鳳墅帖》、《姑孰帖》。

個人專帖：《東坡蘇公帖》（或稱《西樓帖》）、《紹興米帖》、《英光堂帖》、《松桂堂帖》、《忠義堂帖》。



歸納起來，宋代的刻帖有兩個特點。其一，刻帖十分普遍，既有官刻又有私刻。官刻指由朝廷和地方各級政府主持的刻帖工作。私刻範圍更廣，上至王公、大臣下到文人、平民、僧侶都有熱衷者。宋代帝王重書法，喜歡賜字於臣下，大臣為表謝恩便將御書摹刻上石，再饋贈他人。如太宗趙炅淳化二年（九九一）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上言：願以所賜詩刻石。帝為真、行、草三體書各一本，命待詔吳文賞摹勒石以賜。易簡仍以百本分賜近臣。（註一）其二，刻帖內容廣泛多樣，收入名家信札、詩詞、文賦、儒道經典之外，題字、題名、題額、前代碑版、古器銘文等等各色俱有。

元代刻帖，世存稀少。逮至明代，刻帖的發展表現在嘉靖以後，特別是江、浙地區，經濟文化發達，書畫家與藏書家又集中於此，遂成為明代刻帖的中心。明前期刻帖較少，多以宗室刻帖聞名，如周憲王朱有燬於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所刻的《東書堂集古法帖》十卷、晉莊王之子朱奇源於弘治九年（一四九六）所刻的《寶賢堂集古法帖》，此二帖皆仿照《淳化閣帖》的體例，集歷代帝王名臣書法，再添加宋、元人書跡摹刻，影響較大。嘉靖以後私家刻帖逐漸興起。由於輯刻人都為書法家，收藏家和鑒賞家，故選擇慎重，摹勒精善。明季刻帖有案可查者有七十餘種。其中上乘之帖有：《真賞齋帖》、《停雲館帖》、《來禽館帖》、《墨池堂選帖》、《鬱岡齋墨妙》、《晚香堂蘇帖》、《快雪堂帖》等。

明代後期刻帖精良的另一原因是對摹刻的重視。趙宦光曾言：「名帖易存，名石難得。非出於書家手勒（按：即將書跡勾摹於石），非名帖也；非出於精工手刻，非名石也。余家近藏《停雲館法帖》貞珉，乃文待詔為之冰鑒，國博（按：文彭）、和州（按：文嘉）兩先生為之手勒，溫恕、吳肅、章簡甫為之手刻。鏤不計工，惟期滿志。完不論日，第較精粗。凡此諸公每構真跡古拓，非彌月窮年不輕摹拓。」（註二）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摹刻精益求精的要求。

米南宮書

漢十八侯銘

班固

就相國弘榮不造御國

網維東統樞機文昌四友

及至清代，刻帖之風極為盛行，種類和數量遠勝於前代。首先是宮廷刻帖出現了繁榮興盛的局面，清朝統治者雖是滿族，卻傾心漢族文化，歷代帝王對於書畫都十分喜愛，其中尤以康熙、乾隆二位皇帝為代表。康熙、乾隆勤於臨池之外，還喜好組織刻帖。清代帝王刻帖始

於康熙皇帝，他曾敕令摹勒歷代名人書跡彙成《懋勤殿法帖》（圖59）二十四卷和集皇帝自書的《淵鑒齋帖》十卷。乾隆皇帝對書畫的熱愛超過前輩，乾隆元年，皇帝下令摹勒其父雍正皇帝的書作，成《四宜堂法帖》六卷、《朗吟閣法帖》十六卷。此外，他還將內府度藏歷代法書刻成《御製

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圖51)三十二卷，並於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將自己御筆所寫的詩、經書以及臨摹古代書家名跡摹勒上石，刻成《敬勝齋帖》(圖65)四十卷，原石現嵌在故宮樂壽堂、頤和軒兩廊。後又集刻自己御題詩《懷舊詩帖》四卷。並為《淳化閣帖》配上釋文，刻成《欽定重刻淳化閣帖》(圖1)十卷。這些帖刻成後，大多深藏宮苑，傳拓很少，流傳在民間更少，所以知者不多。本卷此次出版，將其部分選出，以饗讀者。乾隆以後，宮廷刻帖活動逐漸減少。刻帖水平和數量也逐漸下降，難復康乾之勢。

除宮廷刻帖之外，清時民間刻帖也呈現鼎盛局面。清代早期的民間刻帖大都是集歷代名人書法的叢帖。如下永譽的《式古堂法帖》雖始於明末，刻成卻已到了清代。下永譽為清初著名收藏家，其所刻法帖，鑒別之精細、刻工之優良，於法帖中可謂一流。至於清代初期集刻個人書法的法帖，以集王鐸書法的《擬山園法帖》(圖55)和集傅山書法的《太原段帖》(圖58)最為著名。到了清代中後期，刻帖之風更為盛行。出現了很多著名的私家刻帖。像曲阜孔繼涑刻有《玉虹樓法帖》(圖75)、《玉虹鑒真帖》、《玉虹鑒真續帖》、《國朝名人法帖》(圖74)等。著名書法家錢泳一生刻帖數十部，其中《經訓堂帖》(圖78)、《清愛堂帖》、《寫經堂帖》、《秦郵帖》(圖100)、《吳興帖》都是刻帖中的精品。清後期，雖然朝政頹壞，國勢日微，但檢點刻帖，仍不乏精品。道光年間潘仕成所刻《海山仙館帖》(圖122)、伍葆恆所刻《南雪齋藏真》(圖124)，光緒年間陸心源所刻《穰梨館歷代名人法書》、楊守敬所刻《鄰蘇園法帖》(圖131)等，皆可稱晚清刻帖之精華。

從刻帖的地域看，康乾時，江浙兩地仍為刻帖的中心。本書著錄之清帖多為該地區輯刻，不再贅述。乾隆以後廣東刻帖勃然興起，當地的富商巨賈，紛紛附庸風雅，結交文士，蒐求法書，競相摹傳。其中著名者有吳榮光《筠青館法帖》(圖112)六卷、梁九章《寒香館藏真帖》六卷、廖姓《觀海堂蘇帖》(圖118)一卷、潘仕成《海山仙館藏真》(圖122)十六卷、葉應暘《耕霞溪館法帖》(圖123)四卷、潘正煒《聽颿樓法帖》六卷、伍葆恆《激觀閣摹古帖》四卷、《南雪齋藏真》(圖124)十一卷、孔廣陶《岳雪樓鑒真法帖》(圖128)十一卷等。

樓者  
介於瀛  
臺南岬  
海中北

### 三、刻帖之編排

經過一千年的發展，刻帖已形成了獨立而完整的系統，帖學也成為一門專業的學科，有着專業的名詞和概念，為方便讀者鑒賞閱讀，特於編撰之際，作簡單說明。

(一) 帖名：帖有名，置於開卷之首，多以隸書或篆書寫。但宋代刻帖多不標帖名，因時人習稱而得名。如淳化帖、大觀帖都以刻帖時之年號而得名。如絳帖、汝帖、潭帖則都是以刻帖的地點而得名。此外，以刻帖主人的齋堂號命名者最為普遍，如閱古堂帖（韓侂胄），寶賢堂帖（朱奇源），東書堂帖（朱有燾），戲鴻堂帖（董其昌），停雲館帖（文徵明），真賞齋帖（華夏）等等。

(二) 卷次：一般而言，帖分卷次，或上、中、下；或一、二、三、四；或子、丑、寅、卯，多標於帖名之下，也有不標卷數者，較少見。特別要指出的是，一部帖通常會裱為若干冊，每冊習慣也稱為一卷，實際上與刻帖時所分的卷次不同。有刻帖結束若干年後，繼續再刻者，稱該帖的續刻，三刻。

(三) 標題：帖中標題分兩級，卷標題和篇名標題。例如《淳化閣帖》十卷標題如下：歷代帝王法帖第一，歷代名臣法帖第二，歷代名臣法帖第三，歷代名臣法帖第四，諸家古法帖第五，法帖第六王羲之書，法帖第七王羲之書二，法帖第八王羲之書三，法帖第九晉王獻之一，法帖第十晉王獻之二。這類標題是標書家，不標篇名，凡淳化閣系統的帖和在淳化閣基礎上增刪之帖其標題大體如此。

還有一種標題形式，如《汝帖》十二卷，其標題如下：三代金石文八種汝刻一，秦漢三國刻書十五種汝刻二，晉宋齊梁陳五朝帝王書三十行汝刻三，魏晉九人書四十八行汝刻四，晉度江三家十七帖四十八行汝刻五，二王帖並洛神賦汝刻六，南朝十臣書汝刻七，北朝胡晉十二人書汝刻八，唐三朝帝后書汝刻九，唐歐虞褚薛書汝刻十，唐六臣書汝刻十一，唐訖五代諸國七人書二百六字汝刻十二。這類標題不在卷首而在卷尾。標題內含時代、書人、品類、篇數、行數、字數等成分，情況不一。



刻帖中大部分帖都不標出篇名，只有少數名篇才標名，如「蘭亭序」，再如被統稱為「晉唐小楷」當中的《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十三行》、《東方朔畫贊》等等。詩文則要有原題的篇名。刻帖中數量最多的是尺牘，尺牘本無篇名，在帖書中往往取尺牘中最初二字或者文中較重要的兩個字定名，如王羲之的《上虞帖》、《王略帖》，虞世南的《左腳帖》、《積時帖》等，皆源於此。

(四) 刻款：《淳化閣帖》各卷卷末有款「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真賞齋》卷末刻：「嘉靖改元春正月既望真賞齋摹勒上石，長州章簡父鐫」。此皆刻款，以示刻帖的時間和帖的主人。刻工師姓名一般用小字另行標出。

帖刻多卷，非一兩年能竣工。刻款表示的是開始，還是竣工，還是中間某個時刻，並不明確。長州文徵明刻《停雲館帖》十二卷，各卷尾年款不同，從嘉靖十六年春正月至三十九年夏四月，歷時二十三年。

(五) 刻跋：指交待與刻帖相關情況的跋文。一般而言，帖之刻跋多在全帖末尾，也有在中間某一卷帖尾。署名有主持刻帖者本人，也有別人代言。如宋代王穉刻汝帖十二卷，在最後一卷末留下題跋申說刻帖緣由：「穉來汝踰年，吏民習其疏拙，不甚諉以事。閉閣蕭然，奉親之外，獨念棄日偶得三代而下訖於五季字書百家，冠以倉頡奇古，篆籀隸草真行之法略具，用十二石刻置坐嘯堂壁。其論世正名於治亂之際，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識者謂之筆史，蓋使小學家流因以博古知義，不特區區近筆硯而已。大觀三年八月上丁，敷陽王穉記。」

#### 四、刻帖之考鑒

法帖的用處主要是臨池習書，這是眾所周知的。此處想討論一個問題：帖的好壞取決於甚麼？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唐君臣書

唐太宗

嶽之秀岳橫基渭  
濱涵之靈水吐岫標



(一) 書法之優劣

對於刻帖來說，好的書法最重要，這有賴於三個因素。第一，刻帖時依據的底本是否可靠，書法好不好。幾乎流傳下來的每種古法帖都有若干本子，或是原跡，或古摹本，或石本。入帖前必須慎重選取好的本子，這是至為要緊的。第二，要有高手摹勒上石方能逼近原貌，毫髮無爽。第三，拓工技術要嫻熟精良，可以達到鈎魂攝魄的境地。三者結合才能使書法精彩動人，缺一不可。

(二) 辨別是原刻還是翻刻，甚至是偽本。

此事需從兩方面入手：第一，找到可信的原刻本仔細校對，若確定為原刻，還有孰早孰晚的問題。早本完好，晚本則損、泐較多。如果帖的原石仍在，就多了一重可信的證據。第二，查閱有關文獻，看情況是否符合前人相關的著錄和記載，帖後的題跋也十分重要。翻刻本是依照原帖拓本摹刻出另外一本，名帖往往有翻刻。翻刻精細者近乎原刻本，尚有價值，翻刻粗劣者面目全非。宋帖傳本罕見，翻刻佳本仍足珍視。偽刻本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將甲帖改頭換面作乙帖，如把標題、刻款移花接木充作別帖。另一種是古帖早已失傳，帖賈據一些記載杜撰拼湊出另一古帖。但當原帖一旦出現，便被揭穿。

於此特舉《松桂堂帖》考辨為例加以說明。一九九五年冬，日本人宇野雪村將碑帖若干遺贈故宮，內有米芾書殘帖一冊。此冊墨紙三十二開，字行很高，前後有附頁，刻手精良，紙墨淳雅，經摺裝，為明前舊物。（註三）封面題簽「宋拓寶晉齋帖雪村題」。前附頁存舊籤：「宋米芾帖」，明王鐸題。另一：「宋名賢帖」，無款。再有成親王永理觀款一條。後附頁存光緒年間翁同龢跋兩則。帖內收藏印有：「明蠡臺袁伯應家藏圖書」、「均齋收藏」、「翁同龢印」等，說明此帖明清時曾被袁樞、翁同龢等收藏。帖的內容順序如下：

篆書「寶晉天下第一法書」八字；米芾篆書「寶晉齋」三字，米友仁跋；米芾書「海岳」二字，米友仁跋，米巨容跋；謝安書八月五日帖；王羲之書王略帖；王獻之書十二月割至帖，米巨容跋；米芾書登山之字，米巨容跋；米芾書蔣延祖夫人錢氏墓誌，向子諲跋，米巨容跋；米芾書淨名齋記，米友仁題；米芾書七律一首（「山晚煙棲樹」）及題記，米友仁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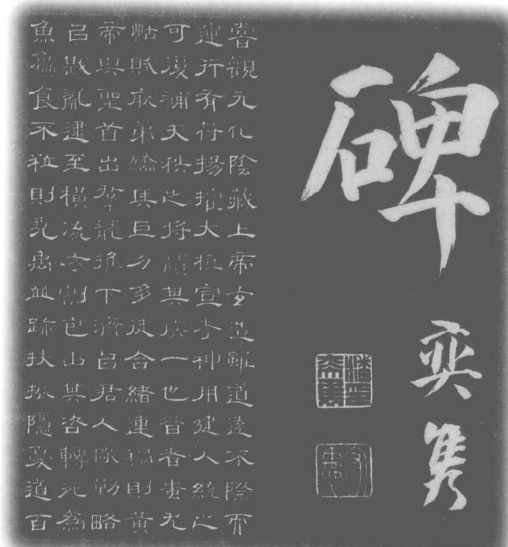
米芾書參賦，米友仁跋，米巨容跋。

前賢為帖起了三個不同的名稱，表明帖名難以確定。那麼，究竟是甚麼帖呢？道光、咸豐年間帖學家程文榮（字蘭川）的《南村帖考》記載過《松桂堂帖》一事：程得到米芾書殘帖二十一頁，然無標題。其中「功名」、「董源」、「淮南」三帖後都刻有米芾重孫米巨容跋。此帖字行極高，刻工也好，是明末涿州馮銓舊物，有張照題記。過去程還見過米芾《禱雨靈驗詩》，後面巨容跋講：「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文簡曹公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因囑石松桂堂，與好事者共之。」又其跋《墨莊帖》云：「用入寶晉齋以永其傳。」據此知皆南宮書跡而刻於廬山之松桂堂也。（註四）由此，程文榮遂稱所得二十一頁米帖為《松桂堂帖》。

故宮的三十二開殘帖後面有翁同龢光緒元年（一八七五）題跋：「是帖不見前人著錄，近人程蘭川《南村帖考》謂：『藏有二十一頁乃涿州馮文安故物，張文敏題記者。』內有《禱雨詩》，巨容跋云：『備員廬山倉掾，因囑石松桂堂，與好事者共之逐日，為《松桂堂帖》。』又謂：『覃溪先生《復初齋集》所稱《英光堂帖》五冊中《催租》、《墨莊》二帖無倦翁跋而有巨容跋。及《浯溪銘》、《呂表民帖》有溫革跋者必皆巨容同時所刻，後人誤裝入《英光堂帖》耳。」又硤山蔣氏有《相義錄》云云。南村所考如此，然終究不知是帖何名，共若干卷也。光緒九年余浮海北行，候風滬上。書賈凌雲閣某姓以是冊求售。開卷爛然，定為宋拓。乃割五十金得之滬上。」

可以看出，翁同龢的印象是「開卷爛然，定為宋拓」。因帖後多有巨容跋，於是將它與程氏講的松桂堂帖聯繫起來。但此帖內容與程講的二十一頁均不同，故翁氏仍存「終究不知是帖何名，共若干卷」的疑問。

一九九五年此帖歸故宮後，啟功甚看重，借回賞析、推敲。歸還之時，於帖後添寫了一篇題跋，曰：「此米友仁孫巨容刻其曾祖所寶晉賢法書與夫溪堂手澤一冊，即謂《松桂堂帖》者也。《松桂堂帖》之名見於近世程氏《南村帖考》。然程氏



僅著錄畸零二十餘頁，今亦不得而見。此本實其首冊。自『寶晉齋』額，『海岳』榜字、謝安及羲、獻三帖，容跋稱摹自石本。以下米老各帖，俱不見他刻，是可寶也！功昔得《淮山雜詠》殘碑拓本，書五律數首，與此帖所刻皆在英光集外。又得王虛舟臨《相義錄》一卷，乃米老起草之文，亦不見集中。帖刻不但米書可喜，其文辭並足輯佚焉。昔年，琉璃廠張彥生曾語功曰：『《松桂堂帖》目錄幸已得見』。不知錄有副本否也？一九九六年一月廿八日」。

啟功先生明確肯定殘帖就是《松桂堂帖》，根據《南村帖考》應有如下理由：（一）宋刻米帖。（二）字行極高。（三）帖後有巨容跋。（四）帖首有「寶晉齋」額，「海岳」榜字，謝安及羲、獻三帖。巨容跋稱摹自石刻。又《南村帖考》載巨容跋《墨莊帖》云：「用入寶晉齋以永其傳」。兩方面相符合。因此，啟功稱「此本實其首冊」。

於是，這本米帖就被定為《松桂堂帖》，今二十一頁本不知在何處，鑒帖不易。至於《松桂堂帖》共定有幾卷，仍有待以後的發現、考證了。

## 五、本書編撰體例

前文已概述刻帖釋義、源流、編排及考鑒等帖學內容，篇幅所限，不再深入。最後，簡單介紹一下本卷編撰體例。

（一）所選皆為具有很高書法價值和文獻價值的法帖原刻本，已無原刻本存世的宋代刻帖則酌收宋、明翻刻本。

（二）以叢帖為主，兼收少數單帖。由於單帖源流錯綜複雜，故僅收入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宋拓本。

（三）每種刻帖著錄以下各項：a、帖名，即帖首標題；b、刻帖年代及拓本年代；c、主持刻帖者、編輯者、摹勒鐫刻

